

在戊戌變法諸君子中，譚嗣同的思想也許是最激烈的，其激烈思想從「仁學」一書可充分窺出。譚嗣同雖私淑康有爲，受康有爲思想影響相當大，但在他未識康氏之前，即已因中日甲午戰爭帶來的危機意識，而確立了自己思想的基礎。譚嗣同的思想是知識與體驗綜合的結果。他的知識來源包羅甚廣，儒學、墨學、佛學與西學均蘊涵其中。這些知識，再加上西力壓迫下民族危機感所促成的親身體驗，塑成了譚嗣同的「仁學」思想。但是他仁學思想的基調並非康有爲的教主觀，也不是中體西

從「仁學」看

譚嗣同的叛逆精神

李永熾

用的折衷思想，而是中國思想中最富行動力的墨家任俠精神。在他看來，知識沒有體驗的印證是空虛的；而體驗沒有知識的導引則是變易無常的。

因而他的仁學思想係由理論和實踐兩部分構成。在理論上，譚嗣同標示「仁」，但此仁未必即是儒家所謂的仁，而是宇宙或人間世客觀存在的原理原則（條理）。此原理原則從整體而觀是不生不滅；從個體而觀是微生滅，亦即生生不息，日新又新。所以從某一角度而言，此條理是客觀的歷史法則，能够自我開展。

在譚嗣同看來，此原理原則——仁的客觀世界是「通」的世界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即是絕對平等的世界，沒有國與國或人與人之間的傾軋，而維繫整個世界的力量是愛，譚嗣同強調墨子的「兼愛」

說，原因即在於此。

但在現實社會上却是一個完全不平等的世界，國與國不平等，人與人不平等。而社會之不平則源自「名」與「習」。名導致上下的臣屬統治關係，習則使人視名為當然，由是人安於「名」份，而忽略自己原有的平等價值，致使人不能成其為人。譚嗣同認為要使人成其為人，必須先破除名教，衝決一切束縛人的網羅，所以實踐在他看來比理論重要，換言之，理論若無法付諸實踐，即無實體，終歸是「名」。譬如「仁」無法付諸實踐，則僅是「名」而已，反而也變成了束縛人的東西。譚嗣同說：「仁之亂也，則於其名。名忽彼忽此，視權勢之所積；名時重時輕，視習俗之所尚。……名本無實體，故易亂。名亂焉而仁從之，是非名罪也，主張名者之罪也，俗學陋行，動言名教，敬若天命而不敢渝，畏若國憲而不敢議。嗟乎，以名為教，則其教已為實之賓，而決非實也。又況名者，由人創造，上以制其下，而不能不奉之；則數千年來，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，則是酷焉矣。君以名桎臣，官以名輓民，父以名壓子，夫以名困妻，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，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？然

而仁之亂於名也，亦其勢之自然也。」

在這名教廣立的世界，要使人均能成其為人，就須每個人都有能動的主體變革力，自主突破一切網羅。此一能動主體變革力，譚嗣同稱之為「心力」，或謂之「叛逆」「變教」精神。他認為所有偉大的人物都有此一叛逆變教精神。當然，這種精神不屬於那些為一己私利而叛的獨夫人物，而屬於那些有平等理念的兼愛者。他認為孔子、耶穌和佛陀都是具有這種偉大胸懷的叛逆者。中國自「絕天地通」以後，只有天子才能祭天，於是「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，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」，而造成君民的極端不平等。孔子刪詩書、改制度，而一寓其權於春秋。春秋惡君主之專制，稱天以制之；又惡天之專制，稱元以治之。「至於佛肸公山之召而欲往，孔子之心見矣。後儒扭於君主暴亂之法，幾疑孔為從逆，而輟遺經大義而不講，彼烏知君者公位也。……彼君之不善，人人得而讖之，初無所謂叛逆也。叛逆者，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，不然，彼君主未有不背叛來者也。不為君主，即詈以叛逆；偶為君主又諂以帝天。……夫佛肸公山之召而欲往，猶民主之義之僅存者也。此孔之變

教也。」而耶穌改變摩西十誡的身分制，以人人爲天子；佛陀變革種姓制度，倡言平等，譚嗣同認爲這些都是變教的叛逆精神。換言之，自主叛離社會不平等制度，以追求全民之平等，即使是叛逆，也是值得讚揚的。何況在自然法的原則下，君主本無統治人民的權利，譚嗣同說，「生民之初，本無所謂君臣，則皆民也。」後因民不能相治，才共推一君，故先有民而後有君，「君末也，民本也。」「夫曰共舉之，則且必可共廢之。君也者，爲民辦事者也；臣也者，助辦民事者也。賦稅之取於民，所以辦民事之資也。如此而事猶不辦，事不辦而易其人，亦天下之通義也。」總之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皆可變易。

譚嗣同叛逆性的主體變革力乃求之於個人，而非求之於團體。他很樂觀的認爲只要人人有衝決網羅的自主叛逆精神，社會即可臻至平等與自由。在他看來，團體一旦爲「名」所惑，很可能促成另一種不平等。所以他的叛逆精神係建基在個人的盡己任俠精神上。他說，仁即是任俠，而個我的任俠經由心力的作用可促使人人的自我覺醒，而導致羣體的變革。

在名教廣立，西力壓迫，人民沉睡的現實社會裏

，譚嗣同認爲，中國變革之道不可採取華盛頓、拿破崙之類的英雄革命，最好莫過於連接反抗壓制政治的陳涉、楊玄感之類仁人志士，若這類仁人志士無機可乘，莫若做過任俠之士，因爲任俠行爲「亦足以伸民氣，倡勇敢之風，是亦撥亂之具。」因而他對中國古代的游俠，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草莽任俠之士都評價極高。不論是中國的游俠，或日本的草莽志士，他們的行動精神全在盡己這一點上。而這種精神經由「一聖人死，其氣分爲衆賢人」，「死此生彼」的作用，可促成全民的風起雲湧。

同樣的，在中國面臨列強侵略的危機意識下，譚嗣同並不贊成狹隘的排外運動，反而認爲外來的壓力適足以促起國民的覺醒。他的自強策大要僅在於「求諸己」，亦即先強自己，而強自己之道則在於國民間的互「通」。

總之，譚嗣同的仁學思想主要在於革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現象，使人人都臻於真正絕對平等的境域。但這種種種境域不是靠別人替自己爭取，而要靠自己衝決網羅的自主叛逆（變革）精神求得。可見譚嗣同實在是極具主體性的個人人文主義者。